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孔子家语》中 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以克莱默斯译文为例

伊咏, 宫宝悦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00)

摘要:文化负载词承载着一个民族独有、特殊、复杂的文化信息,不同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增加了其翻译的难度,对于包含着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中国典籍来说更是如此。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中国本土创建的译论体系,将“翻译内”与“翻译外”相结合,推动了翻译批评的发展。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首先探究荷兰汉学家罗伯特·克莱默斯在从事《孔子家语》译介中的译者行为,进而探讨其对《孔子家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特色,发现其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总体倾向,以期为中国典籍英译的发展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文化负载词;《孔子家语》;“求真—务实”连续统

中图分类号:H315.9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人类文明。大量的史书和文化典籍流传至今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最好见证。典籍的外译是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然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承载着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terms)的处理往往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语际”翻译障碍。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1]232}。文化负载词深深打上了语言社会的地域和时代烙印,其翻译一直是传播中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翻译的极端化,一则完全忽视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源语文化信息,美其名曰“对等”,不利于源语文化传播;二则是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作任何变通,美其名曰“直译”,不利于目的语群体的接受。一直以来,此类文化词语的翻译活动缺乏一个客观全面的批评标准,“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充分考虑了翻

译活动的复杂性以及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把翻译的文本研究和语境研究结合起来看问题”^[2],为我们深入探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行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克莱默斯作为一名优秀的荷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然而,国内鲜有学者关注其翻译家的角色。因此,本文以克莱默斯的《孔子家语》译文为例,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探究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策略,把翻译活动的中心——即译者这个复杂因素考虑在内,分析译者行为对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影响,尝试为今后的典籍翻译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一、克莱默斯译者行为探究

(一)译者动机初探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它是关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资料汇集,自三国魏

收稿日期:2022-02-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孔子家语》英译研究”(16YJA74004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学英译的海外认知与接受研究”(20BYY019)

作者简介:伊咏,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典籍翻译。

E-mail: yiyong@qfnu.edu.cn

引文格式:伊咏,宫宝悦.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孔子家语》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以克莱默斯译文为例[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1):7-12.

王肃为《孔子家语》作注^[3],《孔子家语》就陷入了真伪之辩中,甚至被认作是伪书^[4]。伪造说以中国学者为中心传到海外,影响了西方的众多汉学家。这本书的国外译介和研究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是因为《论语》的熟知度更高,另一方面是受到“伪造说”的影响。克莱默斯前十章的译文问世之前,晚清英国传教士赫真信也翻译了《孔子家语》的前十章,译文在传教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连载发表。后因其离华而“暂停”该书译介^[5]。赫真信译作受到了翟理思的强烈批判,而后并未成书出版,后又有比利时汉学家哈雷兹的译本,也不完整^[6]。

罗伯特·克莱默斯是一位荷兰汉学家,师从著名汉学教授戴闻达。他的前十章译作于1950年作为莱顿汉学丛书之一出版。戴闻达是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的创始人,在他的努力之下莱顿成为荷兰汉学研究的中心^[7]。戴闻达以研究中国历史为主,尤其是哲学典籍。在他的影响下,克莱默斯对儒家哲学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6—1949年间,克莱默斯成为荷兰圣经公会的代表,作为熟识中国哲学和语言的汉学家又担任了香港和台湾圣经公会的翻译顾问,克莱默斯教授后又致力于《圣经》的翻译工作,和吕振中牧师合作完成的中文全译本于1970年问世^[8]。包括戴闻达教授和克莱默斯教授等人在内的荷兰汉学群体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汉学的发展。

克莱默斯在其译作前言中提到,他的目的之一是帮助解决“伪书”这一争论,研究《孔子家语》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及意义,探索它作为早期儒家学说的源头书籍对现代研究的价值。克莱默斯译文从宏观来看,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孔子家语》大致的组成结构、历史流传情况以及王肃本人的生平等内容,在这一部分,克莱默斯引经据典,对《孔子家语》进行比照解读,其阐释客观详尽。第二部分是前十章具体的内容翻译。第三部分是翻译注解以及内容上与《孔子家语》相近的古代典籍供读者参考。韦利评价其译作是对莱顿汉学丛书“艰苦”且“博学”的补充,作者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一部儒学著作从古代到现代复杂的发展过程^[9]。

我们从克莱默斯译文可以看出他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的翻译动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了展示其汉学研究成果,对《孔子家语》真伪之辩梳理与探究,确立其典籍价值及意义;二是为了向西方世界译介中国儒学典籍,加强文化交流;三是

推动儒学哲学思想在西方的学术研究。克莱默斯的生平履历说明其在儒学思想研究及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二)“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

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评价克莱默斯译本,就是将他作为译者的社会性角色因素考虑在内,使得对译本的评价分析角度更加全面客观。译者行为批评(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是由我国学者周领顺教授提出的原创性理论体系^[10]。“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 Model of Evaluation)是其核心内容。“‘求真’是指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10]76-77}换言之,“求真”指向原文,表现为译者努力还原原文信息,而“务实”指向社会,把读者等社会性因素考虑在内。译者在“求真”和“务实”的两个端点之间努力寻求平衡。译者一方面受到身份的制约,努力靠近还原原文内容,另一方面受到社会或读者因素制约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原文意义的翻译调整,像出版机构、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地位等因素都会对译者的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例如辜鸿铭的《论语》译本从文化差异顺应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去除《论语》原著中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从而消除英语读者的陌生感和怪异感,除子路和颜回二人的名字得以保留外,其他弟子的名字一概处理为 a disciple of Confucius^[11]。辜氏译本完全可以放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和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辜氏译本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无疑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译者行为研究是翻译前沿理论研究,发生于后文本中心研究期,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后出现的新变化,基本研究路径是“以人为本”^[12]。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提出的“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认识,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停留在“对等与否”的文字层面上^[13]。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周领顺将批评研究置于翻译的社会学视域下,彻底摒弃把翻译看作从文本到文本的静态结果的片面观念^[14]。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中心,而译者作为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必然存在着复杂性。这就导致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求真—务实”连续统体现的是译者在“语言人”和“社会人”之间不断协调变换的动态过程。翻译批评一直以来都缺

乏科学统一的标准,这样具有创造性且富有活力的批评理论必然会为译本的分析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更加客观全面的视角,推动翻译批评的进一步发展。

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特色及翻译策略分析

本部分借助奈达的文化分类^[15],从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语言文化负载词以及人名等专有名词的角度具体分析克莱默斯的翻译策略,并深入探究背后的译者动机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一) 人名、地名、官职及书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

在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威妥玛拼音在国际上影响力较大且至今仍在西方学术界流行。在克莱默斯的《孔子家语》译本中,除孔子的名字(Confucius)外,其余人名、地名、朝代甚至是个别官职名称的翻译均采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威妥玛拼音虽然接近英文拼读,但并不完全迁就其拼写习惯。克莱默斯在翻译人名、书名、地名、官职等的过程中多采用拼音加注的方法,传承了他那个时代的翻译传统和习惯。这种翻译策略的优点可以用“直接简单”来描述,但其缺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古人有名、字以及尊称的区别,如果都用拼音分别翻译会让英文读者、特别是西方读者当作是不同的人的假象,例如《孔子家语》第三章第一篇中的曾参、曾子、参,都是指曾子,曾参是姓名,孔子称之为“参”是长辈或老师对晚辈或学生的称呼习惯,曾子是后人对其尊称。这类情况在克莱默斯译本中没有很好体现出来(见表 1)。而在介绍《史通》的作者刘知几时,克莱默斯加注解解释为:“刘知几(Liu Chih-chi),后多称为刘子玄,因‘几’字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其名讳,后改为刘子玄”。

表 1 克莱默斯《孔子家语》译文中人名的翻译摘录

人名	译文	人名	译文
孔子	Confucius	子路	Tzū-lu
孟子	Mencius	子贡	Tzū-kung
荀子	Hsün-tzū	颜回	Yen-hui
曾子	Tsêng-tzū	老子(老聃)	Lao-tzū/ Lao Tan

同样,除了《周易》(*Book of Changes*)外,克莱默斯译文中对书名的翻译基本上是用拼音处理,如表 2 所示,忽视了书名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信

息,只看书名只能让读者如雾里看花,不知所云。

表 2 克莱默斯《孔子家语》译文中书名的翻译摘录

书名	译文	书名	译文
《孔子家语》	K'ung tzū chia yü	《国语》	Kuo yü
《左传》	Tso chuan	《礼记》	Li chi
《公羊传》	Kung yangchuan	《周易》	Book of Changes
《谷梁传》	Ku liang chuan	《史记》	Shih chi

克莱默斯对官职的翻译策略是拼音翻译和意译并用,对某些官职根据当今社会的国家体制进行了对等化处理,如“司空”译为“Director of Public Works”“中都宰”译为“the office of Governor of Zhongtu”等等,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但也有许多官职直接做了音译处理,如“散骑常”译为“San-chi-ch'ang-shih”,且未做任何注释说明,不免会使目的语读者产生陌生感(见表 3)。若考虑到译者自身的异语文化背景和所译文化词语的难度较大,克莱默斯对官职仅作音译处理就可以理解了。

表 3 克莱默斯《孔子家语》译文中官职的翻译摘录

官职	译文
散骑常侍	San-chi-ch'ang-shih
中领军	chung-ling-chun
中都宰	the office of Governor of Zhongtu
司空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Superintendent of Works
鲁大司寇	Great Director of Crimes of Lu
诸侯	feudal lords

整体来看,克莱默斯在翻译人名、书名或地名等时,采用了音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对源语文本的忠实性,尽管忽视了原文的文化信息,但可以传音,有助于译语受众了解汉语的语言习惯和表达,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对于官职等的翻译,则是意译和音译并用,对于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有较好对应关系的多用“意译”,其他的则用音译法,当然音译加注解释就更好一些。

克莱默斯采用的音译加注法体现了译者靠近“求真—务实”连续统的“务实”一端,是为满足读者需求的一种目的性行为。译者选择的角色是面向读者的“社会人”,在完成“求真”的翻译任务之后,再通过附注等方式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辅助资料,以降低译文的阅读难度,同时鉴于自身文化视野,对一些较难的文化负载词做出忠实性地音译处理,放弃进一步释义。典籍译者往往受困于目的语

的文化空缺,又要兼顾自己的文化立场和可读性问题,所以不得不在实际翻译中做出一些调整,向“务实”一端倾斜,追求译文的功用和阅读效果。

(二) 物质文化负载词

人类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会创造出一些有形的物质产品以满足自身需要。不同地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习俗各异,形成的物质产品也不同。

“养生送死之节”一直是孔子非常关注的内容,《孔子家语》第一章中就提到了“送死”所用之“棺槨”的具体规格,“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中国古代棺槨分为棺材和套棺,棺在内、槨为套在棺外的外棺。克莱默斯译为“People made inner coffins 4 inches thick and outer coffins 5 inches. They utilized natural knolls and hills as tumuli; they did not raise barrows or plant trees on the graves.”首先克莱默斯对于“棺槨”一词的处理较好地展现了其本身的结构特点,但缺乏相应说明,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次克莱默斯将“寸”这一单位简单地与“inch”对应,明显缺乏准确性。这种处理一方面可能由于译者无法准确判断“寸”的长度,因为中国古时的不同朝代对“寸”有不同的单位标准;另一方面,即使确定了准确长度,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英文词语去表达,直接用数字又会降低译文的可读性,因此,译者在这里做了归化处理,“务实”的成分更大,读者等社会性因素得到凸显,实现了“求真”和“务实”的统一。

《孔子家语·好生》(第十)载:“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馀,不受饰故也。”其大意是“有人说,丹漆漆过的器物不需加纹饰,上好的白玉也不必雕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们的色质纯正,不用雕饰的自然状态就已经很美的缘故。”其中的“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克莱默斯将其译为“Vermilion lacquer does not need refinement, and white jade doesn't need polishing”。丹漆即为朱漆,“朱”为大红色,在孔子的时代,器物用朱漆粉刷是极为尊贵的标志。白玉是宝贵的玉石,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均属上品,常用于形容人的品质高洁。这句话是说:朱漆不借助别的颜色就很鲜艳,白玉不用雕琢就很宝贵。在13世纪,“vermilion”一词就在英语中开始作为颜色使用,且一开始制作工艺复杂,价值昂贵。在《圣经》中,“vermilion”也是作为一种绘制建筑物和艺术使用的颜料,这一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朱红是不谋而合的,可见译者选词之精准,既准确传达了原义,又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

克莱默斯对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是做了归化的处理,选择向“务实”一端倾斜,在“求真”和“务实”之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三) 社会文化负载词

“涉及人际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等词汇,是社会文化语境的催生品。”^[16]《孔子家语·相鲁》中有关于当时鲁国社会制度和风气的描述到,“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克莱默斯译为“*When Confucius first held the office of Governor of Zhongtu, he established rules regarding the nourishing of the living and the burying of the dead; old and young ate different food; strong and weak performed different tasks; men and women walked separately; on the road lost objects were not picked up; utensils were not carved and pretentious.*”

此例的意思是讲孔子刚为官时制定了礼仪,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提倡按照年纪的长幼吃不同的食物,根据能力的大小承担不同的工作,男女走路各走一边,对他人遗失的东西不据为己有,所用器物不求浮华雕饰^[17]。克莱默斯在这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直译法,源语的四字格并列结构包含内容甚多,译者无法在保留原有形式的前提条件下,准确表达出其意义,只能选择舍弃原本较简短的语言形式,将经过语内翻译后的内容再进行语际翻译呈现出来,这是译者忠于自己“语言人”的角色所作出的“求真”选择。

《孔子家语·三恕》介绍了儒家当时推行的伦理规范,孔子用“三恕”很好地解读了中华文化中的“恕道”。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克莱默斯译为:Confucius said: “A noble man has three ways of reciprocity. When you have a ruler whom you cannot serve, yet to expect your servant to serve you, this is no reciprocity. When you have a father towards whom you cannot be filial, yet to expect your son to requite you with filial piety, this in no reciprocity. When you have an elder brother whom you cannot respect, yet to expect from your younger brother to be compliant, this in no reciprocity.”

“恕”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伦理范畴,“这几句话简单来说就是推己及人,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97}“reciprocity”一词本意为“互惠”,即强调双方的对等和互换。该词来自18

世纪中叶的法语“*réciprocité*”和“*réciproque*”,后者来自拉丁语的“*reciprocus*”,意为向前或向后移动。“*reciprocity*”虽不能完全体现中文“恕”的确切内涵,但却是在英文中比较接近“恕”的对等词语。此例的译文不仅相对准确地传达出源文本的意义,还保留了其语言形式,在结构上与源语高度一致。这也是译者从内容和修辞等角度努力靠近原文的“求真”行为,最大限度地将近源语文化特色呈现给读者。克莱默斯作为一名汉学家,同时承担着学术身份和文化身份^[18]。传递文化之真,这是完成作为译者的文化使命的行为。

中国古代的卜卦常用龟壳、蓍草等手段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为未来指点迷津的方法。《孔子家语·好生》:“孔子尝自噬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克莱默斯译为:“Confucius once divined for himself by achillea stalks. Of the hexagrams he obtained bi from it. He changed colour and had an uneasy countenance.”此处是说孔子曾为自己占卦,得了“贲”卦,译者把占卜译为“*divine*”一词,随后又增译了“*achillea stalks*”(蓍草茎)。周人占卜用蓍草,之前的殷人用甲骨。克莱默斯在此处补充了占卜所用工具,向“务实”一端靠近,目的是彰显孔子所处时代占卜的特点,以区别于西方占卜术,保留中国古代占卜文化的特色。译语读者在不了解源语的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只能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去理解译文词汇。”^[1]²³⁷因此,译者补充相应的文化信息是必要的。翻译过程中适量增加原文字面没有出现但实际内容已包含的词,使得译语受众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从而达到保持源语文本意义的目的。

(四) 语言文化负载词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汉语中都存在很多彰显中国特色的成语、习语或民间特定的说法,语言凝练,结构巧妙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孔子家语》中也不乏这样的文化词语,像“冠礼”“五帝”“阜财解愠”“苦口良药”“可杀不可辱”等。克莱默斯翻译语言文化词语主要采用的策略还是直译,以“阜财解愠”为例,原义为厚积财物,消除怨怒,即增加百姓的财富,从而消除百姓心中的忧愁。克莱默斯的译文是“*rendering abundant the people's wealth and relieving their distress*”。译者在准确把握原文意义的基础上“求真”,把文本内容忠实地传达给读者。对于“五帝”这种高度凝练的文化词语,在完成直译“*Five Emperors*”后,分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释,一是指中国上古时期的五位最具影响力的部落

或首领,二是指与“五行”(Five Elements)相关的万物之神,即金、木、水、火、土,这体现了译者面向社会或读者所做的“务实”努力。

克莱默斯作为一名汉学家,兼顾学术身份和文化身份,这一方面制约着他在翻译活动中选择尊重源语的文化信息,向“求真”靠拢,不能对源语内容做随意的翻译调整;另一方面对于较难理解的文化词语或专有名词,要附注相关解释补足译语读者的文化知识空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古代说法,如“乡射礼”,译者只是做了简单的直译处理,并未做过多注解。考虑到其背后的文化信息太过繁杂,总体上可以说是瑕不掩瑜。

三、结语

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借助其“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分析了克莱默斯《孔子家语》译文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视野不只局限于语言微观层面,而是“涉及英译的译者主体性和文化身份等要素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19]。本文通过具体的例子分析,发现克莱默斯对于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主要向“务实”一端倾斜,旨在为目的语读者提供相应的文化背景,尽可能地消除其陌生感。对于其他文化负载词,大多尽力靠近“求真”一端,准确传达词语承载的文化信息,完成自己作为“语言人”角色的使命。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国内原创的新型理论体系把译者这个“牛鼻子”纳入考虑范围,将文本和人本相结合,为译文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客观的视角。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需求十分迫切。文化负载词承载着独特的文化信息,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视角分析西方汉学家的翻译行为能为国内学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帮助他们更好地通过翻译活动,特别是典籍英译,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国门。

参考文献:

- [1]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2] 周领顺,周怡珂. 翻译批评需要怎样的标准? 译者行为批评模型构建尝试[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5):107-117,138,150-151.
- [3] 王肃. 孔子家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4] 王国轩,王秀梅. 孔子家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20.
- [5] 崔华杰. 晚清英国传教士赫真信与《孔子家语》译介[J]. 齐鲁学刊,2013(2):60-65.

- [6] KRAMERS R P. K'ung Tzū Chia Yü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Sections 1 – 10, with critical notes[M]. Leiden: Brill, 1950.
- [7] 张西平. 莱顿汉学研究院图书馆略记[J]. 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7(1): 128 – 131, 47.
- [8] 马利安·高利克, 吕冲, 刘燕. 吕振中: 一位中文圣经翻译家——献给苏黎世大学荣誉教授罗伯特·P. 克莱默斯, 于其80寿辰之际[J]. 圣经文学研究, 2013(1): 72 – 94.
- [9] WALEY A. K'ung Tzū Chia Yü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Sections 1 – 10, with critical notes[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0, 82(3 – 4): 194 – 195.
- [10]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1] 孟健, 曲涛, 夏洋. 文化顺应理论视阈下的典籍英译——以辜鸿铭《论语》英译为例[J]. 外语学刊, 2012(3): 104 – 108.
- [12] 周领顺. 译者行为研究新发展和新思维——周领顺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 2022, 43(1): 1 – 11.
- [13] 曾文雄. 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 外语研究, 2006(3): 45 – 47, 80.
- [14] 刘云虹. 译者行为与翻译批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评析[J]. 中国翻译, 2015, 36(5): 65 – 70.
- [15] NIDA E A.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Problem[J]. WORD, 1945(1: 2): 194 – 208.
- [16] 孙琳, 韩彩虹. 《北京折叠》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生态翻译学视角[J]. 上海翻译, 2021(4): 90 – 94.
- [17] 伊咏, 赵斌. 孔子家语新译[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9.
- [18] 李冰梅. 冲突与融合: 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与《论语》翻译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9.
- [19] 王宏, 沈洁, 王翠, 等. 典籍英译新发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ultural Loaded Words in *the Schools Sayings of Confuci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A Case Study of Kramers' Translation

YI Yong, GONG Bao-yu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00, China)

Abstract: Culture-loaded words bear unique and complicated cultural features of a nation. The immense cultural differences cause difficulties in their translation. A good case in point i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with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as a translation theory created in China, combines “intra-translation” with “extra-transl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Based on the 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 Model of Evaluation in the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heory,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 of the Dutch Sinologist Robert P. Kramer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then discusses Kramers'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is book to clarify h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overall tendency in dealing with culture loaded words.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shed light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culture-loaded words;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